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張伯偉 主編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

張伯偉 著

中華書局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張伯偉 主編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

張伯偉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張伯偉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7.7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張伯偉主編)

ISBN 978-7-101-05718-8

I.清… II.張… III.詩話-文學研究-中國-清代 IV.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81048 號

責任編輯:孫文穎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
張伯偉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90×1230 毫米 1/32·10 印張·2 插頁·24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24.00 元

ISBN 978-7-101-05718-8

總 序

張伯偉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為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祇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祇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為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冊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人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

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紀錄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個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紀錄，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紀、錄為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

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爲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新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爲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

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鑒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為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匯，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為序。

目 次

引 言	(1)
第一章 漢文學東傳研究法舉例	(6)
一 據書目以考	(7)
二 據史書以考	(23)
三 據日記以考	(34)
四 據文集以考	(44)
五 據詩話以考	(54)
六 據筆記以考	(57)
七 據序跋以考	(64)
八 據書信以考	(69)
九 據印章以考	(74)
十 據實物以考	(78)
第二章 清代詩話東傳之途徑	(84)
一 採購	(84)
二 輸入	(97)
三 翻刻	(103)
四 餽贈	(110)
第三章 清代詩話東傳朝鮮之時間及數量	(121)

第四章	清代詩話東傳朝鮮之反響	(155)
第五章	清代詩話東傳日本之時間及數量	(194)
第六章	清代詩話東傳日本之反響	(215)
一	清代詩話與江戶詩風之轉移	(215)
二	清代詩話與江戶詩學之普及	(220)
三	清代詩話理論命題之延伸	(229)
四	對清代詩話的批判	(250)
第七章	清代詩話東傳朝鮮、日本之比較	(254)
餘 論		(277)
附錄	清代中國朝鮮日本歷史紀年表	(285)
引用書目		(297)
後 記		(312)

引言

一

漢籍是漢文化的載體，中國是漢文化的故鄉，然而隨著漢籍的傳播，漢文化也澤被四方，從而在歷史上形成了漢文化圈，並且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留下了大量的漢籍。這些漢籍，相對於中國所存者而言，就可以被稱作“域外漢籍”。目前學術界對域外漢籍的定義尚不完全一致，而我對此的基本定義如下：所謂“漢籍”，就是以漢字撰成的典籍；而“域外”則指禹域（也就是中國）之外。所以“域外漢籍”主要指存在於中國以外的二十世紀之前用漢字撰寫的各類典籍。具體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歷史上域外人士用漢字書寫的典籍，這些人包括朝鮮半島、日本、越南、馬來半島等地的知識人，以及十七世紀以來歐美的傳教士；第二，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以及域外人士對中國古籍的選本、注本和評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籍（包括殘卷）^①。在漢文化圈中，生活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人，然而漢籍卻能超越這些限制和障礙，從而形成相同或相似的道德、禮儀、信仰、習俗，一句話，就是共同或共通的文化。古人說到文字產生之時，“天雨粟，鬼夜哭”^②，站在文化史的立場上看，誰能說漢字的產生不是一件驚天地、動鬼神的大事呢？朝鮮朝初期

① 參見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答客問》，載《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一期。

② 《淮南子·本經篇》，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八，中華書局，1989年版，頁252。

的權近(1352—1409),在《送日本釋大有還國》中有云:“情懷每向詩篇寫,言語須憑象譯通。”^①儘管語言上的差異要憑藉翻譯來彌合,但借助於漢詩卻能抒寫懷抱,溝通彼我之情。朝鮮柳得恭(1749—1807)於嘉慶六年(1801)游中國,在琉璃廠五柳居書肆結識眾多中國文士,有江蘇吳縣夏文燾者贈詩云:“柳州今有集,箕子舊傳碑。國俗兼家學,於君一遇之。”^②將柳宗元之“柳”和箕子國之“舊”結合在一起比況柳得恭,即所謂“國俗兼家學”,流露出的是天下同文、內外一如的觀念。越南使者馮克寬(1528—1613)到北京,在《答朝鮮國使李晬光》中寫道:“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聖賢書。”^③儘管有空間的隔斷,但卻有著一致的文化認同。因此,當我們面對漢籍世界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些用漢字撰寫的文獻當作一個整體,考察其間的聯繫和差異,並進而理解漢文化圈的形成及意義。

我曾經從文學角度出發,討論了域外漢籍和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並從五個方面予以簡要說明,即文學典籍的流傳、文學人士的交往、文學讀本的演變、文學觀念的滲透和文學典範的確立^④。本書所要討論的,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文學典籍的流傳,特別選擇了一個時段(清代)的一類典籍(詩話),以期通過較為細緻深入的探討,獲得較為切實可信的結論;同時,也試圖對本人提出的實證性與綜合性的研究原則作一初步實踐^⑤。

① 《陽村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七冊,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頁28。

② 《燕臺再游錄》,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六十冊,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版,頁303。

③ 《皇越詩選》卷五,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藏。

④ 《域外漢籍與中國文學研究》,載《文學遺產》2003年第三期。

⑤ 參見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載《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二期。

二

文學批評之有詩話一體，起於北宋歐陽修。雖然有人說是“無意創格”^①，但此體一出，後繼者肩摩踵接，“終宋世倣倣稱盛”^②。下逮清代，更可謂洋洋大觀。據蔣寅先生的統計，清代詩話的總數不下於一千五百種^③。而現存之清詩話，以張寅彭先生《新訂清人詩學書目》所列，也在七百種以上^④，超過以往各時代撰述之總和。在漢文學的世界中，詩話之著也蔚為大觀。以朝鮮半島和日本為例，韓國趙鍾業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編纂出版了《韓國詩話叢編》十七卷，彙集了高麗、朝鮮時期的詩話一百五種；日本池田胤則在大正九年（1920）至十一年間，編纂出版了《日本詩話叢書》十卷，收錄了六十四種（其中《東人詩話》為朝鮮時代徐居正所撰，應予剔除）。近十五年來，我在其基礎上繼續收集，日本詩話的數量已超過百種，朝鮮時代的詩話亦有所增補。這些域外詩話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以漢字撰寫，所以，在東方文學批評傳統中，已形成了一個詩話的世界。

詩話之概念，可有廣狹二義，前者如清人林昌彝云：“凡涉論詩，即詩話體也。”^⑤郭紹虞《詩話叢話》亦將論詩絕句、詩格、摘句、序

① 李恒《達觀堂詩話序》，廣文書局影印本，1976年版。案：我認為不能用偶然性來解釋詩話體的產生，它的出現與宋代的文人生活、宋人文學批評意識的自覺以及語錄體的興起和流行有關。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第五章第一節。中華書局，2002年版，頁440—461。

② 同上。

③ 《清詩話考·自序》，中華書局，2005年版，頁2。

④ 《新訂清人詩學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射鷹樓詩話》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頁95。

跋、尺牘、筆記、總集、註釋等統稱為“詩話”^①。而狹義的詩話僅指古代論詩諸體之一，可與選本（含總集）、摘句、詩格、論詩詩、評點等並列。就我的認識而言，應以狹義的觀念來看待詩話，因為論詩性質上的相通不等於著述形式上的相同，混而論之，容易抹煞各種批評形式自身的特點，也無益於進一步探究中外文學批評在更深層次上的異同^②。然而詩話體的大混雜是在清代，以詩話總集而言，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其所收者有詩格（如皎然《詩式》、楊載《詩法家數》），有論詩詩（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有自成系統之著（如鍾嶸《詩品》），有從文集中別裁單行之文（如徐禎卿《談藝錄》）等。在清代，選集可以名為詩話，如陳瑚之《頑譚詩話》；傳記可以名為詩話，如王昶之《蒲褐山房詩話》；凡例可以名為詩話，如管世銘之《讀雪山房唐詩序例》（此書已被收入《清詩話續編》）；筆記可以名為詩話，如王士禎《漁洋詩話自序》稱：“余生平所為詩話，雜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隴蜀餘聞》、《香祖筆記》、《夫于亭雜錄》諸書者，不下數百條。”^③所列諸書皆為筆記，而中多詩話。金埴之《不下帶編》，於各卷之下亦寫明“雜綴兼詩話”；摘句同樣可以名為詩話，如易順鼎之《琴志樓摘句詩話》；注釋也可以名為詩話，如《續文獻通考》“詩文評類”的宋代部分，便將《集千家註杜詩》、《補註杜詩》、《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山谷外集註》、《放翁詩選》、《箋

① 《詩話叢話》指出：“蓋詩話之體，本有二種：一用散文，一用韻文。……由體製言，則韻散分途；由性質言，則無論何種體裁，固均有論詩及事及辭之處。”郭紹虞《照閣室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頁226。

② 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頁465—466。

③ 《清詩話》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頁164。案：正由於有這些特點，所以清人往往從這些筆記中彙集其詩話，如喻士端《分類詩話序》云：“讀阮亭先生《皇華紀聞》、《隴蜀餘聞》、《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分甘餘話》凡六種，其間咏歌散見，評泊所及，輒別擇而彙集之，號之曰《分類詩話》。”此書又名《諧聲別部》。

註李長吉歌詩》等，與詩話類著作一起著錄^①。甚至同樣的內容，可以有不同的名稱，如徐增《說唐詩》，將其“說”的部分獨立單行，即可名為《而庵詩話》。因此，本書所討論的詩話，其範圍乃據清人的看法而取較為寬泛的一種。

本書討論清代詩話之東傳，是指傳入朝鮮和日本而言，在時間上以清宣統三年（1911）、朝鮮李王隆熙四年（1910）和日本明治四十五年（1912）之前為限，此後印出或傳入者概不闖入。

①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八云：“今輯詩文評彙為一編。其有前人之集而後人為之評注者，即以評注家時代為次，如陶詩、杜詩及韓、柳集之類，並從此例。蓋原集已見馬考，今續補以評注人為主，既不得人之別集，而所評注者又係一人專集，不可入總集之內。且《通考》文史一門即收入《杜詩刊誤》《韓文辨証》等書，今做是例，而改其名為詩文評云。”

第一章 漢文學東傳研究法舉例

本課題所處理的對象，屬於典籍的傳播與交流範圍，具體地說，就是考察某一部書在何時何地通過何人以何種方式傳入，在傳入後又如何被閱讀，從而產生何種反響。這就涉及到需要使用哪些文獻以及如何使用這些文獻的問題。前人對此有所討論者，可以日本學者大庭脩為代表，他在《流傳日本漢籍之研究方法與資料》一文中，分“室町時代以前”和“江戸時代”兩部分，分別敘述了其研究方法和資料，涉及到書籍實物、目錄類、記錄類、引用以及和刻本等方面，具體有古鈔本、古刊本、目錄、記錄、引用、題跋、日記、旅行記等，雖然簡略，却頗為全面^①。但漢籍在不同國度的流傳，會因其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等文化環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採擷的資料也隨之有異。此外，討論一般的書籍交流和某一特定種類書籍的交流，其方法和資料雖然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仍有區別。而且，這類課題的難度本不在於列舉綱目，而是詳細闡述。因此，本文擬在前人基礎之上，結合本課題的特點，就漢文學東傳研究的操作方法及使用文獻舉例如下。同時，也兼及漢籍的回流與東書之西傳。

① 大庭脩《流傳日本漢籍之研究方法與資料》，載《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7年版，頁481—492。其後，他在《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社，1984年版）以及《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研文出版，1997年版）等書中，也貫徹了這些研究方法。

一 據書目以考

書目是有關一時一地一人藏書、刻書、售書狀況的記錄，從書目中即可考知是否有某書傳入或流衍。朝鮮時代的書目頗多，我曾經從寓目的約八十種書目中選出二十六種，略分王室書目、地方書目、史志書目和私家書目四類，編成《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它反映了歷史上的典籍交流、收藏等情況，而不同類型的書目又各有其特色，可據以考察典籍流傳的不同方面。以王室書目為例，它反映的是王室藏書，從中便可考見一代中國本藏書的總貌，如《奎章總目》。朝鮮正祖李祹(1750—1800)《群書標記》“命撰一”《奎章總目》下云：

秘府藏書之所，華本在閔古觀，東本在西庫。是書所錄者，閔古觀之華本也。……予於丙申初載肇建奎章閣於內苑，以奉謨訓、峙圖籍。既又購求九流百家之昔無今有者幾數千百種，遂命閣臣徐浩修著之爲目。……凡經之類六十，史之類一百二十，子之類一百四十八，集之類二百七十九。繼此而購得者，將隨得隨錄也。^①

所謂“華本”即指中國本，“東本”爲朝鮮本，《奎章總目》著錄了當時的華本總目，也就反映了正祖初年王室所藏中國本書籍的全貌。

根據王室書目又可考見如何通過王室之命向中國購書，包括其數量、種類及採購重心，如《內閣訪書錄》，它本來就是一部待購書目。《正祖實錄》五年六月甲申條載：

① 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二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頁1172—1173。

倣唐宋故事，撰《訪書錄》二卷，使內閣諸臣按而購買，凡山經海志、秘牒稀種之昔無今有者，無慮數千百種。^①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一云：“前代懸購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闕書錄》，唐有《訪書錄》，宋有《求書錄》。”^②此即所謂“倣唐宋故事”。從這些書目來看，皆《奎章總目》所無，計經部一百三十四種，史部六十四種，子部一百二十四種，集部六十三種。由於這原本是一部購書目錄，便能夠看出當時王室求書的興趣和導向，如其中絕無稗官小說。正祖時期因大臣文章多涉稗官小品之體，因此嚴禁從中國購進此類書，已購入者亦檢出去除。

從王室書目中還可考見朝鮮對中國書籍的翻刻及選評之書，奎章閣藏書有不同書庫，分別收藏“華本”和“東本”，而所謂“東本”，不是以作者分，而是以刊行地分，因此，其中就包含了不少中國書籍的朝鮮刊本以及朝鮮人對中國書籍所作的選本、注本和評本。《西庫藏書錄》就是專門著錄“西庫”藏書的目錄，其中有“中國文集”一類，收錄了諸葛亮《武侯全書》以下共十九種；至於朝鮮人所作的注釋、評論，則集中在經書類、儒家類、禮書類、文章類和詩類中。以後二者為例，如《兩漢詞命》、《歐陽文抄》、《蘇文抄》、《柳文抄》、《王臨川抄》、《杜詩批解》、《香山三體詩》等。尤其是《八子百選》，這是正祖自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中親選者，其目的在於將這些“藝苑之模楷”普及到“下邑兔園之中”^③，因而板本衆多。《西庫藏書錄》著錄了十四種不同紙張的印本，如果與《大畜觀書目》、《寶文閣冊目錄》、《書香閣奉安總目》、《鏤板考》、《各道冊板目錄》以及《增補

① 《朝鮮王朝實錄》第四十五冊，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年影印本，頁249。

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頁10。

③ 《群書標記》，《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二冊，頁954。